金融服务进化论

——政府工作报告金融部分一字之改背后有故事

本报记者 崔吕萍

“金融机构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原话，也是分量很重的一句话。在以往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对于本分，政府工作报告做了“注脚”。

“完善金融机构考核、评价和尽职免责制度”，说白了，遇到该扶持的企业，要敢贷能贷，工作人员不怕找后账；

“推广随借随还贷款，使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业界将其理解为，金融机构要充分理解这些主体的贷款需求是怎样的短、小、频、急，这4个字被总结出来很多年了，但还需要入脑入心，变成行动；

“继续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强化公司治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政策性银行分类分账改革”以及“更好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拓展市场主体融资渠道”，简而言之，金融活水要多渠道汇合，“子弹”攒得越多越好。

这样看，金融守本分，在有所不为的同时，更要有所为。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一字之差

几乎在第一时间，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奚国华掂量出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字之差的分量。他用了“进化”两个字，来形容由本质到本分的变化。

“一字之变，凸显了金融机构的使命与担当。”奚国华这样说。

2020年，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部门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累计设立了1.8万亿元的低息专项再贷款和再贴现资金，对7.3万亿元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发放了4万亿元小微企业无抵押信用贷款，为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发放了2.3万亿元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上述政策措施为3200多万户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时给予融资支持，融资利率和费用率也实现了显著下降。

硬硬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金融业的勤奋程度应当获得点赞。

但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同样任重道远。

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的话说，“十四五”期间，从人民银行的角度看，至少有3件事要做——建立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发展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完善现代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具体说来，还要做好另外几件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面，重点是要以强化公司治理为核心，更好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小微、民营企业发展；通过消除歧视、降低门槛，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使各类市场主体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参与金融活动的公平机会；为适应新发展格局，我们要继续推动境内外各类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而用奚国华的话说，金融资源配置的质量和效率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融资难的问题，在科技创新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上反映尤为突出。

那些痛点

科技创新企业代表未来，它们的融资还会难吗？

“结合其他国家的金融实践，我们的短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发展起步晚和制度不成熟，中国直接融资占比特别是股权融资占比明显偏低，这导致了目前大批优质本土公司由美元基金主导投资，且选择在海外上市；另一方面，与直接融资相比，信贷支持的阶段偏后、办理时间较长、放贷期限较短、贷款利率偏高，其主要原因在于科技创新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奚国华认为，这件事挺难。

要提升金融助推科技创新能力，奚国华有几条具体建议。

比如，扩大VC/PE资金来源，吸纳更多长线投资者：一是用好用活各地方的政府创业引导基金和成果转化基金；二是鼓励大型国有企业继续积极出资参与优质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在考核机制上提高容错度和考核期限；三是鼓励险资、信托、养老金等长线资金继续提高权益投资比重。

同时，伴随注册制改革逐步深化，VC/PE的退出机制更加通畅，这将倒逼机构“投早投小”，利于早期发现优质标的。建议证监会继续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市场化监管思路，加快推行全市场注册制，保持制度的连续性，稳定市场各方预期，进一步提升股权融资的市场化水平。

比如，鼓励本土一流投行做优做强，为科技创新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一是应适度扩大杠杆水平，放大资本中介机构自有资金的效能，产生规模化效果；二是加快从通道型投行向产业投行转变，在严守风险底线的基础上，用产业思维推动企业资本运作；三是以法律责任和声誉机制促使中介机构归位尽责，当好市场的“看门人”。

再比如，重点围绕知识产权融资等方面打造金融创新体系，不断创新融资方式。科技创新企业普遍具有轻资产、高风险、高成长等特点，融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知识产权评估难、质押难、处置难。建议率先针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进行质押，积极扩大知识产权质押类贷款规模。

数字使命

科技赋能金融，确实能走得更远。

事实上，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小微企业这两个大类上，我们身边也不乏案例。

在重庆巫山县曲尺乡，当地农户大多种植脆李或柑橘，微众银行通过微粒贷金融扶贫项目支持建设了龙洞水果交易市场。当地一位果农表示，交易市场成立后，水果更方便运送出去，也让他们更快地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发挥自身金融科技的优势，融合产业协同发展，变输血为造血，实现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为贫困人口发展产业摆脱贫困助力，这是“互联网+金融”探索出的扶贫新路。截至2020年9月底，微众银行的微粒贷金融扶贫项目已正式落地全国41个贫困县（其中国家级贫困县31个），项目总计为贫困地区贡献增值税税额13.24亿元，有效支持了当地脱贫攻坚。

“相比城市，广大农村的金融供给矛盾更加突出，解决供给不足问题，除了中央和地方出台政策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不断创新服务之外，带有互联网基因、具有创新精神与普惠金融决心的数字银行，任务更重。银行业的传统模式和定位，使得广大民众和小微企业被置于服务的末端甚至边缘，很多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这是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的思考，也是他和团队们正在着力解决的问题。

数字银行做得好，银行数字化转型既是必然趋势，更要快马加鞭。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特别提出，在农村金融领域，利用数字化手段来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确实还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要应对来自大型银行和互联网企业在农村金融领域的竞争，农村中小银行必须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不得不说，线上化是农村中小银行无法越过的进程，因为客户和员工都在往线上聚集。而由于自身资金、技术、场景实力较弱，开放共创，选取合适的合作伙伴，是农村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式。”结合李南青谈及的案例，曾刚显然不希望农村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土里刨食”，最佳方案是搭上顺风车。

“两者最核心的合作，是通过信息共享、渠道互换、平台互通等方式与外部各类机构共同搭建多样化的涉农应用场景，建立生产、供销、金融的闭环。”在曾刚看来，这件事做好了，不仅“三农”受益，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也会受益。

那些期待

快一点，再快一点！市场主体认为，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只要能切实改善融资环境，企业就能缓口气、歇歇脚。

“当前，实体经济特别是基础工业产业成本偏高，导致利润缩减，这不仅会削弱中低端产业的竞争力，而且会妨碍我国高端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还增大了资本‘脱实向虚’风险。新形势下，要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我觉得首先应当把实体经济成本降下来，使实体企业有更大发展空间、对资本有更大吸引力。因此，要着力降低企业各类成本，降低实体企业税费、要素成本、融资成本和环保改造成本等，进一步减轻实体企业负担，提振发展实体经济的信心。”每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多蒙德实业集团董事长石磊只要有时间接受采访，就一定会谈到企业融资的问题。在他看来，虽然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但近年来，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多企业仍处于融资难、融资贵、担保难的境地。

“特别是重资产型实体产业，由于投资大，运转成本高，一旦出现贷款逾期或担保等风险时，金融机构会立即‘断血’，然后起诉，企业就官司缠身，被各级法院查封资产、冻结账户，法定代表人被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商务活动，甚至会使优质实体企业也被无辜拖垮。”为此，石磊建议，各级政府、法院和金融机构应从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一限了之、一冻了之、一查了之”，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想方设法保护好合规合法的企业，帮助其渡过难关；打击、清算那些不讲诚信、恶意逃废债务的不良企业。

与此同时，石磊期待，地方政府能加速推动对企业账款的清欠工作。“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对企业的资金周转、正常运行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建议政府开展专项清欠行动，尽快解决拖欠账款问题；或者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让企业缓口气，以便轻装上阵，继续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石磊这样说。

坚持“融合+创新” 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要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表示，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科技，在生产、运营、管理和营销等诸多环节的应用，实现企业以及产业层面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持续释放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正成为传统产业实现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

钟瑛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国内众多中小微企业由于受限于数字技术、资金储备、战略认知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面临数字焦虑和数字化“转型找死、不转等死”的两难困境。此外，目前市场上提供的科技平台多是通用型解决方案，无法满足企业、行业的个性化、一体化需求。

具体而言，钟瑛表示，一方面，中小微企业信息化、专业化程度较低，数字化专业人才短缺，核心数字技术供给不足，数据采集率低、产业链协同难，难以依靠自身实力实现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一些传统企业数字转型思路不清，缺乏战略认知。

如何加快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钟瑛委员表示，在产业数字化推进过程中，应以科技为基础，以共建为理念，坚持“融合+创新”一体化推进思路，加速构建线上线下无界融合全新产业生态体系，切实推动科技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

为此，钟瑛建议，一是着力强化科技平台支撑，将行业数字化平台从单个企业自我建设向行业共同建设转变，通过数字技术整合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并促成行业企业间交易协作和适度竞争，加速形成企业数字合力并共同创造价值。同时以科技平台为依托，探索创新，形成基于数据、专利知识等无形资产的虚拟产业园区、虚拟产业集群等新产业载体，切实发挥这些产业载体集聚融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要素的优势作用。二是着力强化产业生态融合共生，应加速传统企业与数字科技企业跨界融合实现共生共赢，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共生的全新产业生态体系，通过数字化连接建立起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的商业生态，基于各种平台业务数据实时共享提高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响应速度，在催生新商业模式的同时为优化产业结构提供良好生态环境。三是着力强化政府精准施策。随着数字经济正在由起步阶段步入深化阶段，政府在政策措施制定及服务方面也应该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政府通过为传统企业与新兴科技企业搭建线上线下于一体的新型撮合平台，帮助本地企业解决数字化转型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同时基于数据实现精准撮合对接，加大政府方面产业数据开放力度，与数字科技企业合作利用多维度产业政务数据，精准了解产业发展痛点，进而为产业转型提供招商精准对接、资金精准对接、企业精准对接，以此提升政策服务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涂建华：

保障报废汽车回收拆解 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发展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产业，既是环保及资源高效利用的需要，也是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全国政协委员、隆鑫控股董事会主席涂建华给出这样一组数据，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规模逐年扩大，2019年已达2.6万亿辆，仅次于美国。但我国汽车实际回收拆解率一直较低。据统计，2019年我国汽车回收量仅为195万辆，为保有量的0.75%，与美日德拆解率5.6%、7.2%、6.9%存在明显差距。

涂建华表示，我国汽车回收拆解行业起步晚、规模小，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执行，商业模式的探索，拆解技术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这造成了大量报废汽车流入黑市，经过非法改造后在三、四线城市销售，或经地下拆解后将五大总成等零部件翻新销售，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交通安全隐患。2020年，商务部出台《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此举将大大规范报废机动车行业管理，加速汽车回收拆解产业市场化。

当前，汽车拆解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低。在涂建华看来，上述细则允许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出售报废汽车五大总成给再生利用公司，但尚未形成市场规模，绝大多数企业盈利水平低，导致给报废车主收购价低，使车主缺乏通过正规途径报废汽车的动力，造成恶性循环。同时，回收体系尚未完善。旧政策对回收企业资质控制严，“一城一牌照”政策使之只能通过并购扩张市场份额。新细则取消了总量控制，将显著推进市场化进程，但回收体系尚未完善，我国还未形成全国规模的大型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大多为区域性中小型公司。“此外，我们还面临补贴力度相对较低，车主回收动力不强，国内拆解技术落后，产业优势未能凸现等问题。”涂建华补充道。

如何保障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产业健康发展？涂建华建议：一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保护正规企业积极性。针对当前国内正规回收企业利润较低的现状，从税收优惠、增加补贴、加强黑市监管等方面，扶持正规企业更新设备、革新技术，扩大盈利能力，保障这一利国利民的产业可持续发展。二是逐步形成汽车全产业链闭环生产的模式，探索产业合作方式，共谋循环发展之路。三是苦练内功，负重自强，不断研发破碎、筛选等拆解技术，就五大总成、大宗商品、危废材料三大分类实施精细化流程管理，加大技术装备升级，加快产业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提高整体回收效率，降低拆解过程中的浪费及环境二次污染。同时，借鉴德日循环处理经验，完善操作流程、员工培训、技术标准及拆解现场管理，争取在高环境成本负担中实现盈利，为中国环保及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健康发展探索出新路。

全国政协常委叶青：

为“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在A股上市留“门”

本报记者 崔吕萍

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强。截至2020年底，外资持续3年保持净流入，境外投资者持有A股资产突破3万亿元。

外资来了，外国优秀公司也要有个位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注册资本制度，支持外资企业在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在债券市场融资。

但截至目前，外资企业在A股上市进程难如人意。

“一个原因是相关条例细则不够完备。”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青看来，外资企业的主要形式有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已在我国上市的外资企业大多为外资参股企业，主要探索的是外资跨国企业将中国业务整合后在A股上市发行，这些企业的业务主要在国内，参照国内企业上市程序。对于业务在国外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外资控股企业上市，我国没有出台相关的操作细则。

“还有个问题，我国A股上市门槛高，手续复杂，时间较长。外资企业要想在A股上市更是难上加难，有的外资企业在筹备上市期间，就因为各种变数中途放弃了。”对此，叶青颇有感触。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往来更加密切，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增强。因此，叶青建议，试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质企业在我国A股上市，积极拓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质企业的融资渠道，为国外优质企业到我国融资“留个门”。

“首先应当明确外资企业在我国A股上市的法律地位。”为此，叶青建议，对外资企业按照业务范围的不同进行明确界定，对不同类型的外资企业在A股上市进行清晰定义。同时，修改现有的A股上市相关法规，从根源上理顺上市和监管环境。如果现有法规无法改变，则应对外资企业上市所涉及的与现有法律制度、治理结构上的差异和冲突做出足够的预判。比如后续的监管、信息披露、财务报表、执法乃至文件翻译等都需要统筹考量，并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或指导意见。

叶青同时建议，建立试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质企业在我国A股上市的准入名录。优先将科技创新型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纳入名录，对试点企业的上市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上市提供具体指导，简化审批流程，缩短上市时间。

此外，要建立完善的持续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的核心是信息，投资者依赖正确及时的信息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市场依靠真实有效的信息正常运转。建议借鉴欧美发达证券市场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建立科学合理的外资企业国内上市持续信息披露制度。”叶青这样说。

科技推动金融精准服务实体经济

周延礼

新一代信息科技是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变革的新动能。比如快速捕捉数字经济时代金融市场需求变化，有效增加和完善金融产品精准供给；大幅拓展了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销售的渠道和场景针对性；提高交易环节的效率，方便了客户金融资源配置需求，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形成金融服务和防范风险的科技支撑，为资源合理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金融服务极大地降低了对金融机构实体营业网点的依赖：不论身处何地都可以得到高效率的个性化金融服务；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可助力金融机构降低服务门槛和成本；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支农力度需要加大等老大难问题。

与此同时，金融科技还可以提高金融机构防范风险能力：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建立金融风控模型，能够有效甄别高风险交易，智能感知异常交易，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提升金融风险技防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在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金融数字化方面会大有作为；金融机构会显著提升金融业务质量和效益；金融科技服务解决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消费者的获得感、满足感、认可度不断提升，成为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最好的检验。

挑战在于，金融服务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信贷风险防控的难题；发挥金融科技在精准服务和风险防控方面的作用；破解小微金融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当务之急，是加快统筹研发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步伐。

要科学规划运用大数据，加强大数据战略规划和统筹部署，充分释放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的核心价值，建立健全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融合应用机制。

合理布局云计算，搭建安全可控的金融行业云服务平台，构建集中式与分布式协调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架构，提升云计算服务能力水平。

稳步应用人工智能，探索相对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理财业务、授信融资、客户服务、精准营销、身份识别、风险防控等领域的应用路径和方法。

同时，要妥善处理金融审慎监管与鼓励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关系：采取积极措施引导和鼓励金融科技守正创新；坚持金融科技的本质仍然是金融；监管机构要妥善处理和平衡审慎监管原则和鼓励金融科技创新两者之间的矛盾。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保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